

马克思主义及哲学研究

忠恕之道与中国近现代的对外关系

李存山

【摘要】“仁者爱人”是儒家学说的第一义，此即爱全人类并兼及爱物。忠恕之道是“为仁之方”，它具有人类道德的普适价值。儒家主张“协和万邦”，这在中国古代不免与“宗主国”意识的历史局限联系在一起。在中国近代，中华民族经与世界的交往形成了“民族国家”的观念。孙中山率先提出了“振兴中华”和“民族主义”，其中包含着世界各民族平等的思想，蔡元培称其为“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折衷。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它体现了忠恕之道的精神，“来自我们的文化传统，不全是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在21世纪，中华民族正处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与邻为善”、“和谐世界”的外交方针符合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而又有新时代的思想内涵。

【关键词】仁者爱人 忠恕之道 民族主义 世界主义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中图分类号】B25、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2)05—0011—08

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崇尚道德、以人为本的“道德性的人文主义”文化。说其是“人文主义”，乃相对于印度、希伯来文化突显宗教的价值而言；说其是“道德性的人文主义”，乃相对于古希腊文化的“以智能为基点的人文主义”而言。^①中国传统文化的以人为本，即以人为最高价值，亦即《孝经》所谓“天地之性（生），人为贵”，或者说，人是目的，人是价值主体。《墨子·经说上》所谓“仁，爱己者，非为用己也，不若爱马者”，此处“爱己”就是爱人如己，“非为用己”就是不以为人为手段，而以为人为目的。中国传统文化崇尚道德，这从《尚书·尧典》说帝尧“克明俊德”以及《周书》各篇强调“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就已是如此。至《左传》中记载“正

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谓之“三不朽”，道德已被作为中国文化的最高价值。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就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继承了中国上古时期以及春秋时期崇尚道德的文化传统，而又把“仁”提升到道德的最高范畴，明确地提出了“仁者爱人”。

《论语·颜渊》篇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此处的“爱人”首先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爱，即“为仁由己”的自觉、自律、真诚的道德意识；这种道德意识发端于亲子之间真实无伪的道德情感，故“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从“老吾老”、“幼吾幼”推广出去，“以及人之老”、“及人之幼”，进而达

^① 参见徐复观《中国人文精神之阐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第201页。

到“泛爱众”，此即孟子所说的“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所谓“达之天下”，就是要爱普天之下所有的人，并且兼及爱万物。《吕氏春秋·爱类》篇说：“仁于他物，不仁于人，不得为仁。不仁于他物，独仁于人，犹若为仁。仁也者，仁乎其类者也。”“仁”的首旨就是要爱全人类，其次是爱万物，故而孟子说“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下》），宋儒张载也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

“仁者爱人”是儒家学说的第一义，^①为历代儒家所一贯传承。如汉代的董仲舒说：“仁之法在爱人……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仁者，爱人之名也……”（《春秋繁露·仁义法》）。唐代的韩愈说：“博爱之谓仁”（《韩昌黎集·原道》）。宋代的二程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程氏遗书》卷二上），“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爱”（《程氏遗书》卷十五）。至近代的康有为仍然说：“仁者无不爱，而爱同类之人为先。……盖博爱之谓仁。孔子言仁万殊，而此以‘爱人’言仁，实为仁之本义也。”（《论语注·颜渊》）

《论语·里仁》篇载：“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所说的“吾道”当然是指仁道，而推行、实践仁道的“一以贯之”的方法、准则就是“忠恕”。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这里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忠；“能近取譬”就是推己及人，由近及远；“仁之方”就是“行仁之方”。《论语·卫灵公》载，“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忠恕之道中，孔子更重视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公冶长》载，“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这里的“加”就是侵加、强加的意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首先是把他人看作与自己一样

的具有独立意志的同类：我不欲别人强加于我，我也不要强加于别人。孔子说“赐也，非尔所及也”，意即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②

儒家经典《大学》将忠恕之道又称为“絜矩之道”。朱熹《大学章句》：“絜，度也；矩，所以为方也。”“絜矩”犹如言“规矩”，就是指基本的、普遍的道德准则。《大学》云：

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朱熹注：“如不欲上之无礼于我，则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无礼使之。不欲下之不忠于我，则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于前后左右无不皆然，则身之所处，上下四旁、长短广狭，彼此如一而无不方矣。……所操者约，而所及者广，此平天下之要道也。”（《大学章句》）这个“要道”也就是忠恕之道。文中上下、前后、左右等等是喻指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人际关系，而“忠恕”就是最基本（“所操者约”）、最普遍（“所及者广”）的道德准则。它特别突显了一种“角色互换”或“交互主体性”的意识，这种意识符合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的“普遍道德律”，即：“不论你做什么，总应该做到使你的意志所遵循的准则同时能够成为一条永远普遍的立法原理。”^③

忠恕之道既然是人际关系的最基本、最普

① 此不同于西方基督教《圣经·马太福音》所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西方早期来华传教士利玛窦曾以这样的“诫命”来比附儒家的“仁”，他说：“仁也者，乃爱天主，与夫爱人者，崇其宗原而不遗其枝派……”，“夫仁之大端，在于恭爱上帝。”参见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7、131页。

② 宋儒程颐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我亦欲无加诸人”，《中庸》曰“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正解此两句。然此两句甚难行，故孔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程氏遗书》卷18）

③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关文运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遍的道德准则，那么它就不仅适用于本族群的成员之间，而且适用于普遍的人类。因此，当樊迟在另一处“问仁”时，孔子回答：“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孔子有“夷夏之辨”的思想，这种区别并非种族优劣之分，而主要是道德文明程度的高低。虽然孔子高度自觉地认同于华夏文化，但华夏与夷狄同属人类，所以恭敬、忠恕的道德准则“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按照公羊学家对《春秋》经的解释，孔子“内诸夏而外夷狄”，寄希望于首先实现诸夏的统一，以传续华夏文化，进而影响周边各族，使“夷狄进至于爵”（《公羊传·隐公元年》何休注），以实现天下太平。“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二）这种夷夏可以互易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促进了华夏（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相互融合与多元并存，乃至最终凝聚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①

儒家的最高理想是天下太平，此即《尚书·尧典》所谓“协和万邦”。董仲舒说：

仁者，爱人之名也……故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者爱及封内，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春秋繁露·仁义法》）

这里的“王者爱及四夷”就是以爱全人类为“王者”的道德境界，只有如此，才能“协和万邦”，天下太平。如果只是“爱及（本国的）诸侯”，那么这只是儒家所不认可的“霸”；如果诸侯爱及封邦之内的民，那么尚可以“安”；如果只是爱及身边的宠臣，那么其邦国“危”；如果只是爱自己一个人，那么虽在天子、诸侯之位，也只是个自取灭亡的独夫。

孔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论语·宪问》）孟子循此而有“德力之辨”或“王霸之辨”，他说：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

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

所谓“以德服人”，实即一种“软实力”；^②若要“协和万邦”，天下太平，就必须靠这种道德的“软实力”，使人“中心悦而诚服”。所谓“以力服人”，就是靠军事和经济的“硬实力”，此为孔、孟所反对，故而孟子强烈谴责当时的兼并战争：“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离娄上》）

孔、孟对于处理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是道德理想主义的，这在当时的现实历史境况中当然难以实现。孔、孟之后，秦汉两朝都曾受到北方匈奴的严重侵扰，鉴于汉、匈之间长期战争的历史教训，东汉时期的思想家王充也曾提出了“德力具足”的主张。他说：

治国之道，所养有二：一曰养德，二曰养力……此所谓文武张设，德力具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怀，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内以力自备。慕德者不战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却。……夫德不可独任以治国，力不可直任以御敌也。（《论衡·非韩》）

如果说孟子的“王霸之辨”首倡软实力论，那么王充的“德力具足”则表达了软实力与硬实力相结合的思想。十分可贵的是，王充在讲到“力”（硬实力）之不可缺时，仍然强调“内以力自备”，“犯德者畏兵而却”，即硬实力主要用于防御而不是用于侵略。这在当今世界的国际

^① 参见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② “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由美国的约瑟夫·奈在1980年代提出，它是与“硬实力”（hard power）相对而言：硬实力是那种强制他国的能力，而软实力则是指吸引、劝服他国的能力；硬实力凭借的是军事和经济手段，而软实力则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道德、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感召力。参见 Joseph S.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Public Affairs, 2004.

关系中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中国传统文化的“协和万邦”思想，在中国古代受历史和地缘环境的局限，不免与“宗主国”的意识联系在一起。儒家所重视的“夷夏之辨”，虽然认为夷、夏同属人类，“王者爱及四夷”，但也不免有华夏文化的“中心主义”色彩。突破这种局限，形成近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观念，并且主张各民族国家一律平等，这是在中华民族于1840年以后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凌，从而被动地进入“世界历史”才逐渐形成的。

在1840年之前，封闭的清王朝仍以“天朝上国”自居，而视他国为“藩属国”或“朝贡国”。鸦片战争之后，林则徐、魏源等人率先“睁眼看世界”，批评此前“儒者著书……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从而提出了“夫制驭外夷者，必先洞夷情”，^①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此时虽然仍称西方诸国为“外夷”，但已认识到“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②传统的“夷夏之大防”、不可“以夷变夏”的思想已经被打破。继之，洋务派将“夷务”改称“洋务”，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了“制洋器”，“采西学”，“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③此为洋务派“中体西用”之说的蓝本。

如果只承认西学为“技”或“术”、“用”或“末”，那么中国就还没有真正重视西方诸国及其文化。1875年，郭嵩焘在《条议海防事宜》中率先提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④这已经承认西方立国不仅有“末”，而且有“本”。1884年，中法战争失利，担任两广总督的淮军将领张树声在临终前留下的《遗折》中说：

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

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张靖达公奏议》卷八）

1892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的“自序”中引用了张树声的《遗折》，亦提出西方列强的“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⑤这就打破了中国文化的“中心主义”，开始呼吁在政治体制和教育体制上学习西方文化之“体”并进行改革。

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面临着被日本和西方列强“蚕食鲸吞”、“瓜分豆剖”的严峻形势。此时，对中、西文化的评价已发生逆转，如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书》中所说：

夫自东师辱后，泰西蔑视，以野蛮待我，以愚顽鄙我。昔视我为半教之国者，今等我于非洲黑奴矣。昔憎我为倨傲自尊者，今则侮我为聋瞽蠢冥矣。……今非洲割讫，三年来泰西专以分中国为说，报章论议，公托义声，其分割之图，传遍大地，擘画详明，绝无隐讳。^⑥

西方文化的弱肉强食，使“二万万膏腴之地，四万万秀淑之民”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而此时康有为也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大地八万里，中国有其一；列国五十余，中国居其一。地球之通自明末，轮路之盛自嘉、道，皆百年前后之新事，四千年未有之变局也。”^⑦在此变局中，昔日中国的“中央帝国”已成一场旧梦，

① 魏源：《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98~499页。

② 魏源：《海国图志》，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31页。

③ 《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4页。

④ 《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45页。

⑤ 《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3页。

⑥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2页。

⑦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04页。

而现实的中国只是地球上众多的国家之一。如当时的今文经学家皮锡瑞在《醒世歌》中所说：“若把地球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居中央谁四傍？”^①

由康有为发动的戊戌变法，意在使中国“自强而立”，“以图保全国地、国民、国教”。^②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康有为并没有走向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以“天下为公”的世界“大同”为理想。他在《礼运注》中说：

大道者何？人理至公，太平世大同之道也。……讲信修睦者，国之与国际，人之与人交，皆平等自立，不相侵犯，但互立和约而信守之。……公者，人人如一之谓，无贵贱之分，无贫富之等，无人种之殊，无男女之异。……惟人人皆公，人人皆平，故能与人大同也。^③

这在当时可谓一种“乌托邦”，但也突显了中国文化之道德理想与西方文化之弱肉强食的巨大差异。

谭嗣同在戊戌变法期间著有《仁学》，他以“通”释“仁”，在他讲的“通有四义”中首先是“中外通，多取其义于《春秋》，以太平世远近大小若一故也”。谭嗣同说：

全球者，一身一家之积也。近身者家，家非远也；近家者邻，邻非远也；近此邻者彼邻，彼邻又非远也；我以为远，在邻视之，乃其邻也；此邻以为远，在彼邻视之，亦其邻也；衔接为邻，邻邻不断，推之以至无垠，周则复始，斯全球之势成矣。且下掘地球而通之，华之邻即美也，非有隔也。^④

将这一全球“通而不隔”的思想用之于全球化的世界贸易，即他所说：“通商者，相仁之道也，两利之道也，客固利，主尤利也。……庶彼仁我，而我亦有以仁彼。能仁人，斯财均，而已亦不困矣。次之，力即不足仁彼，而先求自仁，亦省彼之仁我。不甘受人仁者，始能仁

人。”^⑤显然，谭嗣同在这里表达了一种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主义”思想，其中浸润了“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精神，而“不甘受人仁”、“先求自仁”则又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甘贫弱，对民族“自强自立”的追求。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孙中山最先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这一口号起初是与“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⑥相联系的，即要推翻满清的统治，恢复汉民族的主体地位，建立民主制的共和国。当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孙中山发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时，他就已抛弃了汉、满之分，而主张“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族，是曰民族之统一”。在对外关系上则主张：“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当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与我友邦益增睦谊，持和平主义，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⑦此时，虽然新生的国家还面临着千难万险，但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近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它所宣示的“和平主义”和“大同”理想既具有新时代的内涵，又继承和发展了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此即后来孙中山在《中国革命史》中所说：“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点，对于满洲，不以复仇为事，而务与之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此为以民族主义对国内之诸民族也。对于世界诸民族，务保持吾民族之独立地位，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驯致于大同，此为以民族主义对世界之诸民族也。”^⑧

① 参见《翼教丛编》卷6《叶吏部与南学会皮鹿门孝廉书》。

②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73、233页。

③ 《孟子微、礼运注、中庸注》，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39～240页。

④ 《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1、296页。

⑤ 《谭嗣同全集》，第327～328页。

⑥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20页。

⑦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页。

⑧ 《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0页。

1924年,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孙中山对其所主张的“三民主义”作了更深入的阐发。关于“民族主义”,孙中山称其为“国家图发达和种族图生存的宝贝”。针对当时一些讲新文化的人把世界主义同民族主义对立起来,“提倡世界主义,以为民族主义不合世界潮流”的观点,孙中山指出:“我们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之后,才配得来讲世界主义。……我们要发达世界主义,先要民族主义巩固才行。……如果民族主义不能巩固,世界主义也就不能发达。由此便可知世界主义实藏在民族主义之内……”。^①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也就是求中国统一、独立、富强,“要中国和外国平等的主义”。^②因此,当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和“民族主义”时,就已包含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和中国如果强盛起来也“永不称霸”的思想。他深信:“爱和平就是中国人的一个大道德”,“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③孙中山高瞻远瞩地指出:

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如果中国不能够担负这个责任,那末中国强盛了,对于世界便有大害,没有大利。中国对于世界究竟要负什么责任呢?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路是灭人国家的;如果中国强盛起来,也要去灭人国家,也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们的覆辙。所以我们要先决定一种政策,要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今日在没有发达之先,立定扶倾济弱的志愿,将来到了强盛时候,想到今日身受过了列强政治经济压迫的痛苦,将来弱小民族如果也受这种痛苦,我们便要把那些帝国主义来消灭,那才算是治国平天下。

在孙中山看来,强盛的中国不会重蹈帝国主义“灭人国家”的覆辙,而是“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担负这个

责任,便是我们民族的真精神”。^④

蔡元培曾评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适合于中华民族崇尚“中庸”的民族性。他说:“三民主义虽多有新义,为往昔儒者所未见到,但也是以中庸之道为标准。例如持国家主义的往往反对大同,持世界主义的,往往又蔑视国界,这是两端的见解;而孙氏的民族主义,既谋本民族的独立,又谋各民族的平等,是为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折中。”^⑤确乎如此,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从方法论上说继承了儒家传统的中庸之道,而在内容上则具有了“往昔儒者所未见”的近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观念,“既谋本民族的独立,又谋各民族的平等”,这从根本上取代了以往的“宗主国”意识,而它又是儒家传统的仁爱精神和忠恕之道在新时代的发扬光大。

三

1949年以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处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之中。难能可贵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周恩来总理首倡,中印、中缅总理在联合声明中共同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为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奠定了基础,得到世界上愈来愈多国家的普遍认可,逐渐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这一准则实则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忠恕之道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应用。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以邻为善”、“和谐世界”的外交方针,则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更加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协和万邦”、世界永久和平的追求。

由周恩来总理首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它所内蕴的基本道德理念就是“己所不欲,勿施

①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0、226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30、247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3、254页。

⑤ 《蔡元培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88页。

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忠恕之道乃处理人际关系的最基本、最普遍的道德准则，而正确处理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不能外于此。它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应用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中，“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就是“恕”（我要捍卫本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他国的侵犯和其干涉本国的内政，则我亦须尊重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他国，不干涉他国的内政）；“平等互利”就是“忠”，亦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各民族国家之间在政治上平等，在经济上互利。只有如此，才能使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不诉诸强权和武力，而实现“和平共处”。

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首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中内蕴了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如周恩来在1963年接见国际友人时所说：“中国人办外事的一些哲学思想”，如“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决不开第一枪”、“来而不往，非礼也”、“退避三舍”等等，“来自我们的文化传统，不全是马克思主义的教育”。^①这里的“哲学思想”、“文化传统”，应该说最根本的就是忠恕之道。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了此前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而提出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重要思想，这也是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相契合的，实际上也是“来自我们的文化传统，不全是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或者说，这些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亦即与中国的具体实践和文化传统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在国际关系上，中国政府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就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流，东西方冷战的格局已经被经济全球化的潮流所取代。在新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下，中国奉行和平发展战略，提出了“与邻为善”、“和谐世界”的外交方针，并且多次重申中国“永不称霸”。显然，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脉相承，仍是以其所蕴含的忠恕之道为国际关系的准则，而又更多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于“协和万邦”、世界“永久和平”^②的追求。

在21世纪，中国正处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正在从一个发展中国家逐渐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强国，孙中山所预想的“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正在成为一个现实。在此过程中，中国内部的“民族主义”会发出强势的声音，而中国外部的“中国威胁论”也会不绝于耳。一个强盛的中国无疑会改变近代以来的世界格局，而世界是否会因中国的强盛而再现列强争霸的历史，这不能不引起国际政治家的疑虑。但从中国文化的传统和中国在近现代所遭受的苦难来说，中华民族既已强烈地感受到国际关系中的“己所不欲”，那么她在强盛起来之后也不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一个强盛的中国不应引起世界的动荡甚或战争，而应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和谐。在此世界大格局的转变时期，弘扬中国文化的仁爱精神和忠恕之道，重温孙中山的“振兴中华”和其“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折衷，“中国如果强盛起来”也不会重蹈列强争霸的覆辙，即中国“永不称霸”等思想，这是很有必要的。孙中山说，“爱和平就是中国人的一个大道德”，承担世界和平的责任“便是我们民族的真精神”。一个强盛的中国不会背离这样的“大道德”和“真精神”。

在20世纪90年代，由德国神学家、图宾根大学教授孔汉思（Hans Kung）等人起草、在“第二届世界宗教会议”上通过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者说“你希望人怎样对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作为“全球伦理”的基本规则。近年，孔汉思教授又撰文说：

真正有未来并确实能为全球伦理作出

①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27～328页。

② 德国哲学家康德在1795年著有《永久和平论》，认为“各个国家联合体的世界大同乃是人类由野蛮步入文明的一个自然的而又必然的历史过程”（参见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7页）。由此可见，东、西方哲人对于“世界大同”和“永久和平”有着共同的理想追求，而若真正实现之，则世界各民族必须奉行忠恕之道或“普遍道德律”的精神。

贡献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这种精神尤其体现在孔子的《论语》中。中国和世界需要一种重新发现人的价值、人的自我主张、人的现实感、道德品质和坚韧性的民族精神；需要一种倡导以真正的人道为核心价值的民族精神；需要一种将所有人都视为社会的一分子，而非孤立个人的民族精神；需要一种将人与人的基本社会关系建立在普遍伦理价值之上的民族精神，这些价值观不取决于普遍的自私自利。目前，中国正在参与塑造人类的未来，在这一进程中，人道感、相互依存感、和谐感等中国伟大人文传统将发挥重要作用。^①

这是孔汉思教授的真知灼见。中华民族和中国

文化的复兴，正在积极地“参与塑造人类的未来”。一个强盛的中国，同时就是对中国“永不称霸”的宣示；一个复兴的中华民族，同时就是一个“谋各民族的平等”的民族。中华民族将与其他民族国家和平共处，建构多元、民主的世界新秩序，努力实现“协和万邦”和“永久和平”的人类理想。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周勤勤

^① 孔汉思：《中国传统伦理为全球伦理提供经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报》2010年6月1日。

“The Way of Loyalty and Consideration” and External Relations of Modern China

Li Cunshan

Abstract: The primary doctrine of Confucianism is “The benevolent man loves others”. The method to implement benevolence is “the way of loyalty and consideration”, which has universal moral value for human beings. Confucian insists that we should “harmonize all countries”. In ancient China, this idea was inevitably associated with the historical limitation that China was the suzerain of other countries. In modern China, however, Chinese people have formed the concept of “nation-state” during the intercourse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Sun Yat-sen firstly put forward “revitalizing China” and “nationalism”; meanwhile, he indicated that all nations should be treated equally. Tsai Yuanpei claimed that Sun’s thoughts were the compromise of “nationalism and cosmopolitanism”. In the 1950s, Premier Zhou Enlai firstly promoted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which actually reflected the spirit of “the way of loyalty and consideration”. Premier Zhou said that “some of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s which Chinese people adapt to handle foreign affairs come from our traditional culture rather than Marxism”. In the 21st century, China is undergoing a “peaceful rise”, thus, the policy of “being a good neighbor and partner” and “bringing harmony to the world” is not only consistent with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but also has its ideological connotations of new times.

Key words: the benevolent man loves others; the way of loyalty and consideration; nationalism; cosmopolitanism;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